



古 典 文献与文化 论 丛

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编
杭州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



98204

C43
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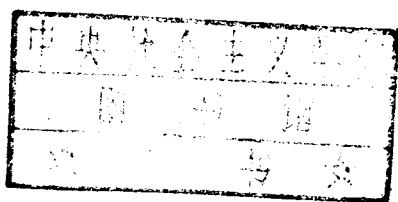


200116212

DI23/21

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

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编
杭州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



中华书局

责任编辑 李解民 李晨光

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

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编
杭州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3½印张·306千字

1997年2月第1版

199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册

定价:26.00元

ISBN 7-101-01554-9/K·680

目 录

《论语》的编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	宫云维 (1)
读礼杂志	吴士法 (13)
《金匱要略》“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”首论探讨	徐光星 (34)
司马彪《续汉书·五行志六》日蚀考辨验证	刘操南 (39)
吴均边塞诗述略	赵家莹 (62)
读卷校经札记	许建平 (77)
敦煌地理文书辑录著作三种校议	张涌泉 (84)
关于《时要字样》等八件敦煌写卷的考辨	张金泉 (95)
宋代两陆峻事迹著作考辨	方建新 (113)
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浅议	初 亮 (126)
朱熹著述考略	束景南 (131)
陈维崧骈文试论	咎 亮 (145)
古籍丛书所蕴涵的中日典籍交流	陈东辉 (157)
论《诗经》中的“之”	祝鸿熹 陆忠发 (173)
《论语》“束脩”句解诂	黄金贵 (189)
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研究与辞书编纂	王云路 (201)
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札记	方一新 (214)
《救夏商二帝》的“冗过”与“穴过”之辨	李 烨 (227)

试论六朝译经中词义发展演变新趋向·····	颜洽茂(230)
敦煌俗语词辑释·····	黄 征(245)
《庄子口义》的训诂·····	杨 黛(255)
同义复词是联绵词一大来源例说·····	胡正武(263)
偏义复词再论·····	曹方人(275)
浅谈隶书疑难字的考释·····	任 平(282)
《汉语大字典》斟误·····	俞忠鑫(290)
《左传》预言探析·····	张卫中(301)
也谈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之名称·····	王宏理(315)
沈约生平中两个问题的考证·····	林家骊(325)
唐道举考略·····	周启成(338)
宋代武官阶类别及其演变·····	龚廷明(351)
论宋代的勒留官·····	祖 慧(368)
李贽的怪诞行为和人生境界·····	周明初(380)
清代今文诗学的整理和研究·····	洪湛侯(396)
从活版到影印·····	崔富章(409)
后记·····	(420)

《论语》的编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

官 云 维

《论语》系何人编撰？于何时编撰？因事涉《论语》之真伪、孔子之形象等重要问题，故自西汉时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，聚讼纷纭，迄今已逾两千年了，成为《论语》学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。笔者拟在前人的基础上，就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，并对《论语》在汉代的流传情况略作钩沉。

一

从现存文献来看，最早提及《论语》编撰问题的，是西汉的刘向父子。刘向在其《别录》中云，《论语》“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”（见皇侃《论语义疏·序》引）。但刘向之言，甚为含混，令人颇摸不着头绪。刘歆在《七略》中对乃父之说进行了修正。他说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与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撰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明确指出《论语》乃孔子之“门人相与辑而论撰”。按，刘歆肯定《论语》为孔子之门人所撰，是大致不差的，时人及后代学者也多所肯定。东汉时班固作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即因袭其说。但是，刘歆之说失之宽泛。孔子一生，弟子三千，登堂入室者也七十有二，其所谓的“门人”是指所有全部孔子门人？还是孔门哪一派之门人？抑或是哪几位具体

的门人？刘歆没有确指。从今本《论语》一书的内容看，显然也不是所有孔子门人都参与了《论语》的编撰的。另从孔子既卒，儒分为八，孔门集团即告分裂，且互相攻讦，以争正统的史实看，让分裂了的孔门各派坐在一起共同编集一部《论语》，也是万万不可能的。

那么，《论语》的具体编撰者是谁？或者说是哪些人呢？对此，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说法，兹择其要者述录如下：

（一）子夏六十四人撰。

《文选·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书》李善注引《论语崇爵谥》说，《论语》系“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，以事素王”。

（二）孔子七十二弟子撰。

东汉赵岐《孟子题辞》：“七十子之畴，会集夫子所言，以为《论语》。”

（三）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撰。

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引东汉郑玄语：《论语》“乃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所撰定”。

（四）曾子弟子撰。

唐柳宗元作《论语辨》称：“孔子弟子，曾参最少，少孔子四十六岁。曾子老而死，是书记曾子之死，则去孔子也远矣。曾子之死，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。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。”“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，独曾子、有子不然，由是言之，弟子之号之也。”（见《柳河东集》卷四）

（五）有子、曾子之门人撰。

南宋朱熹《论语序说》引程颐之语曰：“《论语》之书，成于有子、曾子之门人，故二子独以子称。”（见《四书集注·论语集注》）

（六）闵子騫一派撰。

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二一一引宋永亨之言，以《论语》对闵子騫

称字不称名,认为《论语》出于闵氏。

考以上诸说,《论语崇爵谶》为谶纬之书,“谶者,诡为隐语,预决吉凶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《易》类六),实是汉儒为应合统治者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学术谎言,难以为凭。赵岐以为《论语》出于七十子之手,是对刘歆之语的误读。刘向父子作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,当是宣成之际,《论语》之名早已出现,其所言实是循当时之例。同时,赵岐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,即孔子去世之时,他的好几位高足,如颜回、子路、宰予等皆先其师而去,岂能再去参予孔子卒后才成书的《论语》的编撰呢?

需要认真讨论的倒是郑玄、柳宗元、程颐及宋永亨诸说。

郑玄之说,因其书早佚,不知其所本,但至少有几个问题无法解释:

第一,仲弓、子游、子夏均为孔子晚年的著名弟子。仲弓少孔子二十九岁,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,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。孔子既卒,三人各立门户,聚徒讲学,在战国时期均有较大影响。既然孔子卒后,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集团分裂,且各家自诩正统,相互攻讦,他们三人甚至其门人,怎能坐在一起共撰一部《论语》呢?

第二,今本《论语》记有曾子死事,这说明《论语》的编撰至早在曾子卒之后。考史,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,是孔子晚年的又一著名弟子。据后世学者考证,曾子活了七十岁(见孔继汾《阙里文献考》卷四二),就是说,《论语》的成书时限最早也在孔子卒后四十五年,此时,仲弓、子游、子夏三人的年龄应该分别是八十八岁、七十二岁、七十一岁。仲弓等是否都有此长寿?于史无征。退一步讲,即令仲弓三人都有此长寿,还是不好解释柳宗元、程颐等人提出的《论语》书中除孔子称呼外,其他弟子一律称名或字,而唯曾参、有若称子的问题。

由此看来,似乎柳、程、宋说更有道理。但我们若稍加留心,则会发现,其实柳、程、宋三人都是从同一角度即从《论语》中弟子称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,所不同的是他们都各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,而忽视了问题的其它方面。

细检《论语》一书,除孔子的称呼外,其弟子的称谓是很不一致的。这些称谓大致有以下几类:只称字而不称氏、名的,如子贡、子夏、子张等;只称氏不称字的,如曾子、有子、冉子、闵子;氏、字连称的,如颜渊、闵子骞、公西华;氏、名连称的,如公冶长、宰予、公西赤;直接称名的,如《原宪》篇称原宪为宪,《子罕》篇称琴牢只称牢。此外,在不同的章节里称谓也不尽相同,如冉有,有时称冉子,有时称冉有;闵损有时称闵子,有时称闵子骞;公西赤有时称子华,有时称公西华(参见朱维铮《〈论语〉结集臆说》载《孔子研究》1986年创刊号)。如果按照柳、程、宋的模式去思维,那么,《论语》的编撰者就不特是曾子弟子、有子弟子、闵子弟子了,还应该加上冉子弟子,抑或其他弟子。柳、程、宋三说恰好相互否定,又相互补充。如果再考虑到《原宪》、《子罕》两篇原宪、琴牢二人称名不称氏、字的事实,那么,《论语》的编撰者之列是否还应再加上他们二位?至少《原宪》、《子罕》两篇的编撰与他们是不无干系的。清刘宝楠就据此怀疑过《原宪》一章系原宪所记(见《论语正义》该章疏)。如此一来,问题岂不是变得更加复杂了吗?

其实,问题原本很简单,只不过是让后来的研究家们搞复杂了而已。

现在,让我们再回到对上引刘歆《七略》中那段话的理解上来。我以为,刘歆这段话至少告诉了我们以下两条重要消息:

第一,《论语》是孔子弟子的听课记录的结集。既然当时弟子各有所记,最初的《论语》本子就不是一种,而是多种。曹聚仁先生曾

推论说：“孔门弟子三千人，即算那升堂入室的七十二子，他们该有七十二种不同的《论语》。”（曹聚仁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，三联书店，1986年版，第153—154页）曹先生所言未必确切，但在当时有多种《论语》本子存世当无疑问。

第二，进行《论语》结集工作的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。

这样一来，问题似乎就明了了：当时孔子弟子各有自己的听课记录，孔子卒后，各家的弟子又将其师的讲课记录整理成册，在本门传授。

征之于史，尽管年代久远，文献不足，但还是能够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的。

其一，《论衡·正说篇》曰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，敕记之时甚多，数十百篇。”按，从当时的情况看，一部《论语》不可能有数十百篇。汉初流传的三《论》之和也仅六十三篇，远谈不上百篇。这里的“数十百篇”当指各种《论语》篇数之和。就是说，在三《论》之外，还有数十篇，或者更多的《论语》篇章存在，惜其未载（或许王充之时，就已见不到了）。

其二，从现存先秦两汉文献来看，大量的孔子言行并不见于今本《论语》。有人曾对《孟子》一书所载孔子言行作过统计，《孟子》书共记载孔子言四十八条，见诸今本《论语》的仅三条（见郭沂《〈论语〉源流再考察》，载《孔子研究》1990年第4期）。其它先秦文献，如《荀子》等书，所称引的孔子言语甚至没有一条见诸今本《论语》。这些不见于今本《论语》的孔子言语来自何处？恐怕更多的是源于《论语》的其它版本。

其三，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提到所谓“《逸论语》”的问题。《说文》“衰”字下解云：“《逸论语》曰：‘玉粦之玼兮，其璫猛也。’”“莹”字下解云：“《逸论语》曰：‘如玉之莹。’”何谓《逸论语》？显然是指不

见于三《论》的其它《论语》版本的拾遗集。逸者，佚也，顾名思义。据清人朱彝尊考证，这种《逸论语》还见于《初学记》、《文选》注、《太平御览》等（见朱彝尊《经义考》）。我们说，对这些《逸论语》出处最合理解释只能是它们源于那些业已失传的《论语》的其它版本。

如果上说不谬，那么，今本《论语》称谓不一致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：当时，孔子弟子各有自己的听课记录，孔子既卒，各家弟子各依其师所述，整理成册，在本门传授。曾参一派所撰称曾参为曾子，有若一派所撰称有若为有子，闵损一派所撰称闵损为闵子，冉有一派所撰称冉有为冉子。

问题至此还没有结束。既然孔门弟子各有自己的《论语》版本，门户之见又甚深，又为何能“兼收并蓄”于一书呢？

我们赞成这样一种说法，即这是由《论语》的流传方式所致的（见郭沂《〈论语〉源流再考察》）。

考汉代影响较大的两种《论语》本子（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、《古论》的内容来源已不可考），《张侯论》是张禹将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“合而考之”而成的。郑玄《论语注》是“以《张侯论》为本，参考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而为之注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的，都是在诸家基础上改编而成的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最初的《论语》版本在流传过程中，是经过改编的。至于改编的时间，似应在汉初，而不是先秦。因为如前所述，孔子既卒，儒家分裂成许多学派，各派的对立情绪浓烈，门户之见甚深，在这时改编《论语》是不可能的。但经历秦代的焚坑之后，情况则会有所变化，甚至是较大的变化。这是因为：

（一）此时距孔子之卒，已有二百多年，孔子的第三代、第四代乃至第五、六代弟子也都相继离开了人世，有些门派甚至已经失传。战国初期儒家各派的门户之见，在他们的六传或七传弟子那里，当不至于如其师祖般深。

(二)战国中、后期,适应走向大一统的社会发展大势之需要,思想界也呈现出综合之势,如《荀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,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。这对孔门各派捐弃门户之见不能不有所影响。

(三)秦始皇焚书坑儒,是对先秦诸子的一次普遍打击,孔门各派肯定也难以逃脱。史载孔子九世孙孔鲋藏儒家典籍于“祖堂旧壁”(见孔元措《孔氏祖庭广记》卷一)中,背负礼器,往奔陈涉,“为陈王涉博士”(见《史记》《孔子世家》、《儒林传》),就足以说明问题。试想,在这种形势下,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障,有谁还会去争什么“孔门真传”?

(四)汉兴,叔孙通靠“知变通”而取得高祖信任,为汉室制礼作仪,为儒家开辟了一条进身之路。但不久,这条进身之路就因吕后、文帝崇尚黄老之术而遭到阻扰。司马迁说“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,儒学亦绌老子”(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),儒学各派能不团结起来,共同应敌?

既然由于共同的利益所系,儒家各派能够破除门户之见,那么,大家坐下来,将各家的《论语》改编、混合,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由于诸家《论语》有的已失传,有的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损佚,在新改编、混合的《论语》中对孔子诸弟子的称呼或多或少、或尊或卑也就容易理解了。

二

以上我们探讨了《论语》的编撰问题,现在,我们再来谈一谈《论语》在汉代的流传情况。

秦始皇立国伊始,为维护其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,“焚《诗》、《书》,坑术士”(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),传世的先秦文化典籍大都遭焚,《论语》自然也在劫难逃。但《论语》的流传并未中绝。汉初名儒

陆贾作《新语》就多次引用过《论语》，如《道基》、《术事》、《辨惑》诸篇所引“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缁”，“季孙贪黷夷之地而变起萧墙之内”，“昔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‘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’有若对曰：‘盍彻乎？’”等。文帝时博士贾谊作《新书》，亦屡称引，如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《汉书》贾谊本传亦记贾谊引《论语》“孔子曰：‘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毋（无）讼乎？’”至于董仲舒著《春秋繁露》所称引《论语》，更是多达十余例。这至少表明《论语》在汉初的传播是较广的。

汉初传授的《论语》是哪几种本子呢？于史有征的只有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和《古论》三种。刘向《别录》说：“鲁人所学，谓之《鲁论》；齐人所学，谓之《齐论》；孔壁所得，谓之《古论》。”（见梁皇侃《论语义疏·序》引）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撰写的，属今文经学派。《古论》是用古文撰写的，属经古文学派。

三《论》出现的时间，唯《古论》较明确。据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·鲁恭王传》及《汉书·艺文志》等记载，武帝时，鲁恭王刘余欲拆孔宅旧壁以广宫室，竟然发现壁中藏有一批据说是孔子九世孙孔鲋所藏的古文经传，其中一部就是《论语》，因用古文撰写，故称《古论》。关于《齐论》和《鲁论》的出现和传播，似乎应稍晚于《古论》。证据有两条，一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先《古论》，后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的排列顺序。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每一类中列在第一位的，都是该类书中出现最早的。如，《易》类第一部是“《易经》十二篇”，《尚书》类第一部是“《尚书古文经》四十六卷”，《诗经》类第一部是“《诗经》二十八卷”，其它类也无一例外。《古论》被排在《论语》类的第一位，显然不是无意的。另一条证据来自王充《论衡》。《论衡·正说篇》有“至昭帝读二十一篇”语。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，《古论》、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的篇数分别为二十一篇、二十二篇、二十篇，昭帝所

读当为《古论》。这说明,昭帝之时,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可能还没有出现。

就三《论》的篇章而言,《鲁论》二十篇,《齐论》二十二篇,较《鲁论》多出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,另二十篇的内容也较《鲁论》为多。《古论》二十一篇,无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,但分《尧曰》篇为二篇。

三《论》之外,据王充《论衡·正说篇》说,“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,得二十一篇,齐鲁河间九篇,三十篇”,似还有第四《论》——《河间论》的存在,惜其书早佚,其内容、篇章均无从知晓。

三《论》在汉代的传授情况,据考证,传《古论》的有孔安国、孔腾、许慎,传《鲁论》的有夏侯胜、夏侯建、萧望之、朱云、扶卿、龚奋、瑕丘江公、右师细君、韦贤、韦玄成、张禹、包咸、班伯、周氏,传《齐论》的有王吉、贡禹、庸谭、宋畸、五鹿充宗、王卿。此外,还有一些不知宗派的,如王尊、尹敏、范升、刘辅、贾逵、郑众、何休、马融、郑玄、谯周等(见清唐晏《两汉三国学案》卷十),大抵都是综合学派的。如贾逵“弱冠能诵《左氏传》及《五经》本文,以大小夏侯《尚书》教授,虽为古学,兼通五家《穀梁》之说”(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)。郑众“从父受《左氏春秋》,精力于学,明《三统历》,作《春秋难记条例》,兼通《易》、《诗》”(《后汉书·郑众传》)。何休“精《六经》,世儒无及”,不仅撰过《春秋公羊解诂》等,还注过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(见《后汉书》本传)。马融“才高博洽,为世通儒”,既“注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三礼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列女传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离骚》”,又欲训《左氏春秋》(见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)。均是兼通经今古文学的大儒。至于郑玄,更是如此。下文我们还将详细谈到。

在上述传授《论语》的学者中,有三位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。他们是孔安国、张禹、郑玄。

孔安国,字子国,孔子十二世孙,武帝时任谏大夫,临淮太守。

少从鲁申公受《诗》，或从伏生受《尚书》，以治《尚书》为武帝博士。恭王坏孔子壁发现古文《论语》后，以今文读之，为之训解，凡二十一篇。何晏《论语集解·序》：“《古论》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。”皇侃《论语义疏·序》亦称“《古论》，为孔安国所注，无传其学者”。同样的记载还见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：“《论语》”孔安国为传”。但由于孔安国注《论语》最早见于王肃《孔子家语后序》，而不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后世学者多疑其为孔安国伪作，如清陈鱣《论语古训》、沈寿《论语孔注辨伪》等。疑是。

张禹，据《汉书·张禹传》，字子文，河内轵（今河南济源县东南）人。少从琅邪王阳，继从胶东庸生习《论语》，以“经学精习，有师法”闻。初元（前48—前44）中，因博士郑宽中之荐授皇太子《论语》，为光禄大夫。成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、给事中，领尚书事。河平四年（前25）代丞相，封安昌侯。其时，传《论语》者有鲁人扶卿、夏侯胜、王阳、萧望之、韦玄成等，而“篇第或异”，张禹因以据王阳、庸生所授，“采获所安”，为《论语章句》以献之。是为《张侯论》，亦即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录“鲁安昌侯说，二十一篇”。

《张侯论》是见于文献记载的《论语》的第一部改订本。何晏《论语集解·序》称，“安昌侯张禹本受《鲁论》，兼采齐说，善者从之，号曰‘《张侯论》’，为世所贵”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称，“安昌侯张禹受《鲁论》于夏侯建，又从庸生、王吉受《齐论》，择善而从，号‘《张侯论》’，最后而行于汉世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记更详：“张禹本授《鲁论》，晚讲《齐论》，后遂合而考之，删其烦惑，除去《齐论》、《问王》二篇，从《鲁论》二十篇为定，号‘《张侯论》’。”其改订的情况大致如此。

《张侯论》在《论语》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。《汉书》本传记《张侯论》“最后出而尊贵，诸儒为之语曰：‘欲为《论》，念张文。’”由是学

者多从张氏,余家浸微”。足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。灵帝时刻熹平石经,所据底本即《张侯论》。稍后于张禹的包氏、周氏作《论语》章句,亦都是用《张侯论》为底本(见何晏《论语集解·序》)。郑玄注《论语》就《张侯论》而参考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(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),魏何晏作《论语集解》又集孔、包、周、马(融)、郑等说(见该书《序》),《张侯论》是今本《论语》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郑玄(127—200),字康成,北海高密(今山东高密一带)人,是东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。据《后汉书》本传记载,郑玄初师京兆第五元先,通《京氏易》及《公羊春秋》,继师东郡张恭祖,通《周官》、《礼经》、《韩诗》、《左氏春秋》及《古文尚书》,最后师从扶风(今陕西咸阳东)马融,学贯群经,精研经义。后来,他遍注群经,史称“括囊大典,网罗众家,删裁繁诬,刊改漏失。自是学者略知所归”。《论语注》即是其遍注之群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郑玄《论语注》是继张禹之后,《论语》的又一次大改订。何晏《论语集解·序》说,郑玄“就《鲁论》篇章,考之《齐》、《古》,为之注”,《经典释文》以为郑玄所据为周氏之本,《隋志》则说郑玄“以《张侯论》为本,参考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而为之注”。如前所述,《张侯论》是对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的改编,周氏本所据为《张侯论》。因而,可以肯定,郑玄《论语注》是对《鲁论》、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,或者说《张侯论》、《古论》的再改编(不一定是第二次)。

郑玄《论语注》的意义,在于他统一了《论语》的今、古学派,即统一了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和《古论》诸学派。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他遍注群经,开创了经学的小一统时代。此前,东汉学术界的情况是学者各名其家,“守文之徒,滞固所禀,异端纷纭,互相诡激”,“经有数家,家有数说,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,学徒劳而少功,后世疑而莫止”(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)。《论语》各家的传授情况

虽不一定“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”，但“家有数说”、“异端纷纭”却不能否定。在此情况下，郑玄改编、混合诸《论语》而为之注，也就是统一了各家《论语》，开辟了《论语》学的小一统时代。“郑《论语注》行而齐、鲁《论语》不行矣。”（皮锡瑞《经学历史·经学中衰时代》）从此开始了《论语》的郑玄时代，直到曹魏何晏作《论语集解》，郑玄《论语注》才趋式微，但《论语》的基本框架却因之而定，并成为何晏《论语集解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今本《论语》的一个重要来源。